

《臺灣社會學刊》第 65 期
2019 年 6 月·頁 179-189 【書評】
10.6786/TJS.201906_(65).0004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Linking Activists to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 By Yun Fan. New York,
NY: Routledge. Pp. xiv+160. 2018. \$114.58.**

179

書
評

陳韻如

陳韻如(✉)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通訊地址：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社會科學院6樓615研究室

Email: chenyz@mail.ntpu.edu.tw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June 2019, 65: 179-189 / Book Review
10.6786/TJS.201906_(65).0004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Linking Activists to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 By Yun Fan. New York, NY: Routledge. Pp. xiv+160. 2018. \$114.58.

Yin-Zu Ch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187

書評

本書探討了台灣社會運動在民主轉型年代中的發展與變化。作者以勞工、環保和婦運三種社會運動為例，分析社會運動策略在變動的政治環境下如何轉變，並指出在同樣的政治脈絡下，社會運動的組織模式和策略變化不盡相同，唯有透過運動參與者的生命傳記背景分析，才能有效地說明政治機會結構對社會運動的影響。

本書的理論對話和主要內容

本書欲探討的問題包含：在相同的政治環境下，社會運動的發展為何有所不同？以及更進一步，政治機會結構影響社會運動的機制為何？在晚近的社會運動研究中，政治機會結構是一個核心的理論概念，它經常被用來說明外在政治環境如何影響社運的形成和發展（McAdam et al. 2001），本書的研究問題觸及了社運研究中相當重要的理論問題。既有研究對於政治機會結構如何影響社會運動所提出的解釋機制，可以大致分為兩者：其一是，政治機會結構所集結的結構性及制度性因素，由於對不同社運議題的開放和友善程度不一，因此其影響效果也不同；另一個說法則是：因為不同社會運動對相同政治環境的認知和詮釋並不相同，所以導致不一樣的策略選擇（Gamson and Meyer 1996）。

這些研究檢視了社會運動的政治脈絡和組織層面的因素，然而其盲點在於忽略了社會運動中的行動者所扮演的角色。在政治機會結構的相關討論中，制度和組織是經常被探討與分析的對象，相較之下，社運中的「人」卻鮮少被看見。本書作者的主要論點是：社運者的背景和生命經驗是外在的政治機會結構和內部社運策略之間的重要連結，在特定環境下，參與者的生命傳記是影響社會運動決策的關鍵因素。

為了探討生命傳記的影響，作者挑選三種社會運動進行比

較，分別為勞工、環保和婦女運動。以此三種社運為研究對象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為其中恰好包含了兩種「新」的和一種「舊」的社會運動；二為這三種運動皆於1980年代就已成立了全國性組織。研究資料為1998-1999年與30位社運人士的深度訪談、140多份社運參與者填寫的問卷、田野觀察和文本資料。

本書分為七章。在導論介紹研究主旨、理論架構和方法後，第二章開始討論政治機會結構的改變如何影響到社運參與人士的生命傳記背景。一方面，政治機會結構可作為行動者進入社運團體的篩選機制（filter mechanism），同時，隨著歷史變遷，每個進入社會運動的人，其個人背景因素和生命傳記也不盡相同；另一方面，政治機會結構也帶來轉移機制（shift mechanism），因為新政治機會的開啟，也讓部分社運人士得以轉入體制內。作者分析147位社運者的資料，比較威權時期及選舉自由化時期（以1992年為分界），社會運動行動者的生命歷程變遷。研究發現：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行動者參與政治的機會也有所不同，相較於威權時期，在民主政體建立初期參與社會運動者，更容易、也更有機會離開社運圈，進入政治體制。而就持續參與社會運動時間長短來說，不同社運的參與者也呈現參與時間長短的差異，相較於其他兩類以男性參與者為主的社會運動，婦女運動者持續參與的時間較長。

在第三章中，作者探討政治環境變化和勞工運動行動者意識形態轉變之間的關係，主要分析政治機會結構篩選機制所產生的效果。在分析中作者指出，勞工運動的政治意識形態會隨著政治環境變遷，從政治行動者轉為階級行動者，早期的勞運人士關注民主改革，後期則更注意經濟議題、經濟政策的變化。因為他們分屬不同的政治世代，所以在社運發展過程中，會對國家政府的正當性抱持不同的看法，這也反映在他們行動的激進程度上，如民主化後的勞運人士通常會選擇遊說和抗議兩者並進的運動策

略，不願與政黨掛勾或參與體制內合作。

第四章則用環保運動的例子，來說明政治機會結構的轉移機制對環保運動發展的影響。環保運動作為少數擁有草根動員能力的全國性運動，在發展初期就已形成如台灣環境保護聯盟這類的領導性組織，其下有11個地方分會，在中央層級有高社經地位和高教育程度的成員投入，地方上則有傳統中產階級、小資本家的參與，這使環保運動得以結合科學知識和地方宗教儀式作為動員基礎。多數成員在進入環保運動前就會有過高度的政治參與經驗，在民主轉型下，他們從體制外的社運參與轉移到選舉政治的參與，因此讓環保運動的資源大幅減少。同時也因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成員與民進黨關係密切，隨著新政府局勢的出現，使得環保運動較難吸引新進成員，進而無法維持過去的草根動員能力。

婦女運動的發展則與環保運動完全不同，如第五章所提及的，婦運一開始就採取政治中立的態度，不以草根基礎的專家遊說作為主要策略，到後期才開始發展地方的社區婦女團體，並積極地加入體制內的改革。這樣的發展與早期婦運成員的生命傳記背景變化有關，早期婦運成員的教育程度高，且多為外省族群，使得這些女性在進入婦運前較少有政治參與經驗，但是於1994年後加入婦運的成員，則有高比例的閩南和親民進黨背景，新的政治機會結構伴隨著社運成員的族群背景變化，使婦女運動發展出新的組織策略。

在分析三個社會運動於1980和1990年代的發展後，作者描述了在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三種運動的發展，尤其是三者 and 政黨及政治體制的關係：相較於其他兩個運動，婦女運動反而有更高程度的體制內參與以及政策影響（第六章）。

本書的重要貢獻

就社運研究來說，本書採用的理論框架更細緻地討論了政治機會結構如何影響社會發展，以個人的生命歷程作為政治機會結構和社運發展的中介，說明政治機會結構和社運的政治意識形態、組織資源的增減和動員，以及運動策略的發展。國外也有許多研究探討行動者的生命傳記對社運發展的影響（Goldstone and McAdam 2001），但是這些研究在回答這個命題時，多側重社運者的社會結構位置所提供的可能性，以個人因階級、性別和種族所擁有的資源類別，以及所需面臨的結構性限制，來解釋參與的可能性及社運策略的選擇，如：高教育程度者偏好需要專業知識的倡議工作、女性傾向較溫和的抗爭方式。本書和這些著重生命傳記的社運研究不同的地方在於：作者不僅是分析個人生命歷程和社運的關係，更結合集體的生命傳記背景與政治機會結構來探討社運路線的轉變。

本書作者以量化和質化資料呈現1980至199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圖像，同時也記錄了社會運動和國家政府體制發展之關係的多種樣貌。前者讓讀者了解社運參與者的政治意識形態、族群背景、社經地位的不同以及台灣公民社會組成的多樣性；後者則讓我們看見在民主化下，社運、體制和公部門的多元互動關係。

若隱若現的性別和政黨傾向

本書「性別差異」和「政黨傾向」這兩個概念隱諱曲折地反覆浮現，但在沒有更多的討論下，留下許多臆測和聯想的空間。

在書中婦女運動作為研究案例，有別於環境和勞工運動的發展，婦女運動在民主化後才出現更多的政治參與，並逐漸增強和

政黨政治的連結。本書的貢獻在於作為少數台灣婦運研究成果，其透過比較以凸顯婦女運動的特殊性，但可惜的是，作者僅說明婦女運動參與者在踏入運動圈前的政治化程度較低，相較之下，環保運動者有較多的政治經驗，作者以此解釋這兩個運動和政黨政治的關係發展為何正好相反，但是研究資料顯示：39 位婦女運動成員都是女性，而受訪的環保運動者 38 位中僅 3 位女性（24 頁和 70 頁），換言之，兩運動參與者在政治經驗上的差異很可能與其性別差異存在高度關聯。政治機會結構雖然轉變，但是卻持續對女性帶來限制，在威權時期無法累積政治參與經驗、在民主選舉初期參選機會較少，這些都可能讓以女性為主的婦運和其他男性主導的運動採取不同策略，也可能解釋為何婦運人士的社運參與時間較其他兩個運動長，但是書中對於這些性別影響並沒有更多的討論。

此研究的背景為 1990 年代的民主轉型時期，民進黨的崛起和執政是政治機會結構轉變的關鍵。作者找到的社運策略選擇的關鍵，如政治意識形態之於勞工運動、高度政治化經驗之於環保運動、族群身分之於婦女運動等因素，都影射了社運參與者的政黨傾向。在晚期兩黨獨大的政治環境，加上社會運動應維持其自主性、不與政黨掛勾的理想下，社運者個人的政黨認同和社運發展的關係為何？其又如何影響社運策略的選擇？此類問題極少被處理，而作者雖沒有進一步討論，但是研究結果卻顯示了政黨傾向影響著社運行動者對政治機會的判斷及因應，社運成員和政黨的關係對於社運發展的影響值得更多研究深入探討。

多重比較研究的困難

本文試圖透過比較不同社會運動，多層面地檢視核心論點：一方面從個別社會運動的例子來探討政治機會結構如何透過個人

生命歷程背景因素（學歷、族群、政治經驗、政黨傾向）對運動的發展產生影響，而對於勞工、環保和婦女運動則分別在第三、四、五章有個別的詳盡分析和討論，結果顯示政治機會結構的轉變影響勞工運動者的政治意識形態，進而改變了行動策略；因環境運動者和政黨關係緊密，隨著政治機會結構的改變，也將導致社運資源的減少；而政治環境的轉換則讓更多婦運人士加入政治體制並選擇新的組織策略。這些結論能有效證明，在政治機會結構和個人生命歷程背景交錯之下，對社運發展所帶來的效應。

即便作者企圖經由三種社會運動的比較來檢視其論點，但是卻沒有清楚的共通解釋，僅能隱約得出一些結論：婦女運動參與者與勞工、環保運動人士的個人背景有差異，婦運參與者學歷較高、無明顯政治傾向，致使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較少被納入體制內（所以參與時間較長），同時也造成運動策略的轉變，在民主選舉後較願意和國家政府進行協商。勞工和環保人士則因較早參與黨外運動，民主化後隨著民進黨進入體制內，進而導致運動資源減少，讓後來的運動走向較為激進。然而，針對比較研究，我們期待看見的是更系統性的說明，亦即在原先的理論架構下，能夠解釋這三種社會運動的哪些差異？研究架構中的篩選機制並沒有清楚地跨運動比較，是政治機會結構篩選了哪些人進入哪些運動？還是經由社運議題篩選，讓特定生命傳記背景的人進入特定的社會運動？理論上應該兩者同時進行，但從目前的分析方式，無法得知是議題本身占了極大因素，還是如同作者所說政治機會結構決定了行動者的生命歷程背景特徵，抑或兩者分別的影響為何。

結論

本書研究的是1980和1990年代的社會運動，這些研究結果

應如何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作者不僅提出了一個理論框架，以社運者生命歷程結合社運發展、政治機會結構，研究也顯示社會運動者在實踐其理念的同時，具有學習和反思的能力，新的參與者會依照先人的經驗來判斷政治機會以及決定行動策略。以學生運動的例子來看，在野百合運動後，社運者體制內的參與經驗讓學生學到應該和政黨政治保持距離，但2008年完全和民眾分離的野草莓運動，又讓社會運動者發現體制參與管道的必要，故2014年318運動之後的選舉又有不少學生參加、投入政壇或和政府體制合作，這是否也是因為學生的生命歷程背景和政治機會結構的交互影響而產生的結果？

在後現代社會中，政治行動變得越來越個人化，這也使社會運動轉向日常生活的理念實踐以及提倡另類的生活模式，如許多環保團體並無強烈政黨傾向、在體制外運作，卻也不採政治化的抗議手法，而是偏向理念推廣和交流。另外，短暫、非組織式的集體佔領抗議活動也逐漸增加，這些新興的運動策略是否可從本書的研究架構來分析討論？或者政治機會結構如何對這些非組織性、短暫的集體行動產生影響？有待未來研究的發現。

參考書目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mson, William A., and David S. Meyer, 1996,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Pp. 275-290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edited by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one, Jack, and Doug McAdam, 2001, Contention in Demographic and Life-Course Context. Pp. 195-221 in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ited by R. R. Aminzade, J. A. Goldstone, D. McAdam, E. J. Perry, W. H. Sewell Jr., S. Tarrow, and C. Til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